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

[丹麦] 李 来 福

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家李来福(Leif Littrup)1988年来华考察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状况。李来福在华期间,同我国史学工作者广泛接触,并搜集了一些世界史书刊。1989年他发表在丹麦《文化与历史》杂志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一文,以他的史学眼光,介绍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现将此文节译出来以供参考。

30年代初,在华中一个偏僻小邑里,一位年轻人发现一本书,他在该书中读到了下列内容:“前已说过,英诺森三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的受监护人费里德里希二世是长大成年了。同样真实的是罗马教廷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欧洲业已长大成年了。近代有见解的研究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同情罗马教廷的根本思想,即以一个全世界的公正统治来保持全球和平的思想,同时也不可能不承认拉特兰政策中渗透有许多高贵的成份。如果不使我们人类被破坏性的种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所毁灭,迟早人类必将实现普天下的和平;这个普天下的和平有必要采取一种政府形式,那就是说,一种护法组织,用‘宗教的’这一词最好的意思来说,即一种统治人类的政府,通过人人都受教育,在思想上协调一致,而对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前途和命运抱有共同看法来进行管理的政府。”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罗马教廷是第一次明确地有意识地试图在世界上提供这样一种政府。我们不能过于认真地检查教皇权的缺陷和不当,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吸取的每一教训,必然对于我们形成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已试图举出罗马共和国崩溃的诸主要因素,现在我们试图应当诊断罗马教会为什么不能获得人类的善意而把它组织起来。”

这位年轻人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之一的吴于廑,而这部书便是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吴于廑在一篇论述中国世界史学科前景的文章中提到了上述内容。他还评论了韦尔斯的历史哲学,并强调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和把人类在历史和自然中统一起来的观念。他进而指出,韦尔斯的这部著作是企图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史是所有国家历史总和这一思想的重大尝试。而欧洲中心论等思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普遍存在的。

吴于廑的评论未特别触及到该书的其它任何部分,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地集中于上述引文。韦尔斯在这段引文中关于中世纪教会和它作为世界政府潜在能力的论述,对于任何一位熟悉中国人的有关国家和统治世界这一传统概念的读者来说,都必然是一个挑战。50多年以后,

吴于廑写道：自孔子的时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都是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并把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知识用于经世致用。

上述引文中关于欧洲正在成长的论述，对于读者来说也一定是个挑战。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时代人类社会的有机发展，最终形成更大的单位，这种发展必将导致我们用整体观念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在当今中国史学界中，整体世界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如下基本概念：人类社会在时间上的纵向发展，或多或少地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人类社会横向联系的发展，则促使其结成更大的单位，进而将世界各个地区融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学者正在追求一种世界通史的模式，这种模式既能描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能使所有国家、民族得到恰当的论述。纵向的观点（即经线）和横向的观点（即纬线），对于编写这种模式的世界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寻找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

韦尔斯著作在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可以由中国出版新译本这一事实得到说明。新版本是根据韦尔斯之子主持的修订本翻译的。据新译本出版者的说明，之所以在中国再版此书，是因为这是一本广泛叙述民族的形成和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著作，同时也因为它是有一定价值的参考读物。

中国的世界史学无论在韦尔斯的书出版之前还是出版之后，都深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传统中国历史学所说的“天下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史。当19世纪中国人认识到为了同西方世界竞争，起码能与之抗衡，必须向西方更多地学习时，这种关于世界史的概念就不适宜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关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著作出版了。作为补充，也翻译了一些高质量的外文著作。一份19世纪末以来的书单表明，40种外国史书籍中，大多数都是翻译的。而20世纪前半叶关于世界史的出版物，至少一半以上是译作。

一些译作译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在本世纪30年代有一定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关注世界史，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既适合中国的发展，也适合其他国家的发展。他们接受了在苏联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公式：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然经历五种社会经济发展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为了使中国历史符合这一公式，他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

1949年后，苏联对待历史的这种观点和方法，被中国各级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所全盘接受。课程开始分成泾渭分明的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史教材译自俄文教科书，所有教学环节都依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其论述的主题就是，所有社会的发展都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根据当前的观点进行定性解释。这种历史模式的主要目的和结果，就是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相信，所有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都参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苏联社会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中译本，1959年在中国出版。1984年，一位学者在论述该书分期体系的特点时写道：“它把某些世纪作为全世界范围内进入奴隶社会的时期，又把另一些世纪作为全世界范围内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这样，世界历史似乎象具有某种‘生物钟’的独特生命那样，具有自己的‘历史钟’，全人类似乎都要按照它预定的时刻，依次甚至同步进入某一历史时期”（庞卓恒：《把握两个关键问题》第12页）。

苏联的这部世界通史后来成为周一良、吴于廑1962年主编的《世界通史》一书的样版。两人在1949年以前都在美国留过学，他们是由教育部任命而承担此项任务的。这部书的初稿是

由几所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参与下而编写的。但两位主编对书稿进行了本质的改造与加工,在近代以前的部分尤其如此。以至于许多当年参加编写初稿的中国历史学家现在提及此事时,也都认为此书之编写应归功于两位主编和各分卷主编。

该书的整个结构在初版的每卷序言中都作了介绍。古代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初两个阶段的历史:即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史和奴隶、奴隶主两个阶级对立斗争的奴隶社会史。从时间上看,它始于人类社会的形成,结束于公元5世纪后期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崩溃,对原始社会阶段的论述,按通例不分国别,综合全人类历史这一阶段的进程。对奴隶社会阶段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埃及、西亚、印度和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中心,并重点阐述各奴隶制国家的历史,本书不包括中国上古史。

在中古这一卷的序言中则写道:中古史是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封建社会中以农奴或农民阶级为主的各被统治阶级同统治阶级不断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封建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终于19世纪中叶,而非洲、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远在许多国家封建制度已经充分发展甚至衰亡之后,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刚在发生,有的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占有制阶段。但是,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封建生产方式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仍然有着明显的断限,上自公元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崩溃起,下迄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前后共历约1200年。

近代史卷则写道:近代史概述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产生的,它通过人民群众一系列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最后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比封建制度进步,但它同样是一种剥削制度,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逐步尖锐,后来又引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构成了近代史的主要内容。

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普遍模式的首次重大尝试,但结果是明显地陷入了欧洲中心论。中国历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这些毛病。据周一良介绍,他们也想摆脱这一模式并找到中国的模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过,与苏联的世界史相比,这部书更加强调了亚洲史。尽管这部世界通史没有写中国,但是编者通过各卷都附有中外关系的章节,力图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1988年10月6日与周一良的谈话)。

这部书持续使用了多年,但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72年中国对世界史的兴趣又日益明显起来,这种兴趣是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激发起来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教师编写了一部新的世界史。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新版,同时重印。

根据吴于廑1988年的谈话,这部世界通史的优点是,在从1949年以来所有史学研究都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中,阐明了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书中还纳入了中外关系。弱点是:把世界史嵌入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而这个框架是在对各地区尚未进行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世界分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论述,而没有显示出其有机的发展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没有包括中国历史,这就排除了中国同中国以外世界的联系(1988年12月2日同吴于廑和安长春的谈话)。

周、吴编《世界通史》于70年代又重印了一次,但是作为教材,它却被北京大学出版的世界史所取代,直到80年代一些新的世界史教材问世。北大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贯穿革命事件的

阶级斗争史,换言之,是一部政治史,忽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

二、面向世界的新开放

1976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随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日益明显。文化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在公开论战中受到质疑,面对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大多数历史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现在必须在摆脱旧的教条主义的研究基础上,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1978年12月,一批世界史专门杂志创刊了。这些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用新的观点研究和讲授世界历史。这些杂志至今仍在出版。现在,在一般历史刊物和学术杂志上也登载这方面的文章。

1978年,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历史学家已摆脱了近20年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在此之前,与外界的联系是有限的。充其量也仅仅是同共产主义国家发生联系。历史学家已能获得多年来受到限制的外国研究资料和一般教科书。2、中国研究本国史的传统一向很强,但研究中国史的史学家同外界更加隔绝,一旦开放,中国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史应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得到的好处,比世界史学家更大。3、现有的世界史是根据传统模式撰写的,这种世界史偏重欧洲史,并且把中国史排除在世界史外。4、以前的历史研究中,许多领域和课题被视为禁区。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共同呼吁消除这些禁区。这些禁区,有一些是历史学家内部形成的,这是教条主义广泛流行的结果;另有一些禁区则直接出于各种政治决定,例如苏联和美国历史的许多领域和课题是由政治决定造成的。现在,杂志上大量刊登在1978年以前长期被认为是禁区的文章,这表明冲破禁区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

所有这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都成为世界通史新模式应当考虑的。1983年至1985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出出版新的世界通史的计划后,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框架的讨论立即紧张地开展起来。这部多卷本世界通史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型的世界通史,编写这部新的世界通史,并不打算把它作为教材或者读本,主要在于表明研究的状况。可是,研究水平太低,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这项工作暂时停止了,目前还没有立即恢复的计划。

编写新型世界通史工作的延期所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是,大中学的世界史教材教科书仍沿袭旧的模式。经验表明,要彻底改变世界通史的旧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国家教委已经组织力量编写一部大学世界史教科书。另外,也出版了一些由一所或几所大学协作编写的教材。但是,它们都沿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的模式。据我所知,只有两种(蒋国维,1985年;安长春,1987年)包括了国史。中学教材更少有改变。普遍高中全部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高中世界史教材的改变,取决于整个世界史观点的改变,而只有当这种改变的观点为历史学家普遍接受时才行得通,即使教科书作者想早点改变也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一批著名历史学家编著另一部6卷本世界史。这部书的主编是吴于廑和齐世荣,刘家和与王敦书负责古代部分,朱寰和马克尧负责中古部分,刘祚昌和王觉非负责近代部分,彭树智和齐世荣负责现代部分。其中只有吴于廑和朱寰是1962年版《世界通史》主编的代表。绝大多数主笔者是本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未曾留洋海外。

为了解决新的研究之不足,决定保留以前世界史著作中的精华。同时,尽可能多地吸收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新研究成果。大多数历史学家,至少大多数老一代史学家似乎都持这种看法:

彻底打破传统世界史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们似乎也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研究世界史的目的应该是揭示世界发展的规律性。

三、经 和 纬

关于编写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的主要问题,由中国教育出版社的李纯武于1984年作了概括:1、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都要包括进来,当然也包括中国。2、不能把欧洲作为世界史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以其它中心取而代之,如以亚洲为中心,或以亚、非、拉为中心。3、必须吸取外国的研究成果。4、必须以历史事实的叙述为基础,而不能写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抽象概括。所用的历史资料必须反映世界各国的有机发展,而不是仅选一些能说明其观点的历史事实。5、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地论述。

这里将适当引用一位美国著名中国、中亚历史学家小约瑟夫·F·弗莱彻关于整体世界史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用刺绣品来说明这一问题。地区的连续性就像刺绣品的纬线那样,以左向右延伸,而各个社会的历史连续性就像刺绣品的经线那样,从上向下延伸。在刺绣物后面置一光源,我们从正面观察。我们注意到:每根透明的经线、纬线都是由不同颜色的透明织物所制成,如果我们的目光沿着一条黄色纬线看,当经过代表土耳其奥斯曼土地制度的蓝色透明经线时,我们会看到一种绿色;而当这条黄色纬线经过代表西藏寺院土地所有制的红线时,我们又看到一种橙色……这样,就使整个刺绣物的结构显得更加复杂,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刺绣物。……经线往往以其明亮的光泽和不同造型掩盖了纬线的联系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纬线,也就组织不成刺绣品,顶多是一袋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线而已。”

郭圣铭于1984年发表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体系》一文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说法,历史学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的指导下,以年代为经,以地区为纬,来叙述世界各族人民的历史。”

在中国的世界史编纂学中,“经”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它既指时代的连续性,又有“经典原则”的意思。可是“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过,在多卷本世界史的讨论中,已经出现强调“纬”的倡议,用吴于廑与弗莱彻的话来说,就是“横向历史”。吴于廑是横向历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按照吴于廑的意见,研究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同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生产方式发展规律一样重要。他的研究农业社会、游牧社会以及它们在欧亚大陆的相互影响的著作,就体现了这一思想。按照吴的说法,农业社会通常是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它能生产一些剩余产品,而游牧社会通常没有这种剩余产品,世界上存在过几种仅有有限联系的农业文明。但是,在农业技术方面,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经历,这种技术曾在大部分农业带传播。这些农业带包含大陆的亚热带和南温带地区。它们也有着遭受游牧民族袭击的共同经历。这些游牧民族常用和农民同样的技术,甚至更加优越。游牧民族生活在北方,在阿拉伯则多居于南方。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共有三次冲击。第一次冲击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第二次冲击始于公元后几个世纪,其中包括日耳曼人对罗马的侵袭,突厥人对中国的侵犯,接着是阿拉伯人及稍后土耳其人对西亚和欧洲的攻击;第三次大冲击是蒙古人对欧亚的进攻,这是游牧民族最后的侵袭。

游牧民族在农耕社会之间的交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游牧民族的游动,一个例子是造纸术传到西亚和欧洲,便是中国人于751年败于阿拉伯人的结果。还有许多其它例子。一些游牧民族在征服农业地区以后试图继续其征服前的生活方式,但往往被农

耕文明所同化。约于公元1500年,农耕社会在技术方面永远超过了游牧社会。这时,游牧社会发动的攻击,不仅仅是被击退了,而且农耕世界也扩张到游牧地区,并且统治和剥削他们。游牧民族的这种征服史,通常都被农业社会记载下来,而且这种征服也常被描述成一连串的无休止的破坏暴行。实际上,他们是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服务的,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游牧征服者未能使各农业社会之间永远保持联系,也不能抹煞这种影响。这种永久性联系只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开始资本主义后才有可能。此后才真正开始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和不可分割的世界史。

但是,仅有纬没有经仍然不能织成网。大部分历史学家(至少大多数老一代历史学家),仍然赞成五种生产方式发展说,但也认为必须容许历史的多样性。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时他们也称之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被作为世界所有主要地区都普遍出现的生产方式,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另一方面,奴隶社会就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生产方式了。1986年新当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的胡钟达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个层次的划分和第二个层次的划分,都是经过严密的科学的论证的,虽然论证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有些局部甚至还需要加以订正,但那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不可怀疑的。”“至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再进一步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能认为是科学上的假说,它需要以科学研究的实践来检验。”

按照胡的说法,所谓第一个层次,是指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经过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第二个层次则是指每个阶段内的小的时代的划分,如从蒙昧原始共产主义进入野蛮原始共产主义,从前资本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等(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第180页)。

经过进一步分析后,他断定: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从生产力看,两者之间找不出可以同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标志。从生产关系看,由于在所谓奴隶社会中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奴隶也不少,奴隶制曾与农奴制长期并存,奴隶与农奴之间往往划不清界线。

计划中的多卷本世界史编者吴于廑和齐世荣,同意在世界范围内把中世纪的开始定在公元300年前后,但是认为近代的开端则应在公元1500年前后。吴于廑是本书的主要审定者,起码在当代以前的部分是如此。他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也是武汉大学15、16世纪研究室的领导者。我们早先就了解到,他非常重视地理发现和资本主义开端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并把文艺复兴看作形成近代世界的重要因素。罗荣渠提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更广泛改造的建议,他不同意单线发展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僵化的结果。他写道:“对历史发展单线的最尖锐的挑战是现实的挑战。既然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又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条件,为什么远没有具备这一物质条件的国家首先跃入社会主义?如果历史单线发展论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历史单线发展论就是错误的。”(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论》第8页)。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框架,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相互联系。

在他看来,生产力只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生产力阶段、农业生产力阶段和工业生产力阶段。

它们的区别在于其能源不同,如人力的、畜力的、机械的(蒸汽机能、电能、核能)等。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从原始生产力阶段进入农业生产力阶段,而进入工业生产力阶段是在18世纪,而不是16或17世纪。每一阶段的生产力都可能产生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经济形态,这取决于自然和历史环境。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或许还有亚细亚制,所有这些重要的生产方式,其基础都是农业生产力。这些都可以在欧洲历史中找到较为充分的文献依据,但这一说法是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它地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回答。

四、世界与中国

世界史的范围就是世界,而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对这一点,看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既有如何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问题,也有如何组织研究和撰写世界史班子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中国的历史系通常都分成几个教研室,教中国史的同教世界史的分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教研室中。

时间概念也是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中遇到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在纪年方面,还是在每一个文明时代进行比较方面,传统的中国纪年法以朝代和皇帝为准,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但是,我们发现高中的中国史和世界史课本,甚至大学里的中国史通用教材仍然在使用古代中国的纪年法,起码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是如此,只是有时也在括号中标出公元纪年。这有其好处,它可以使学生熟悉传统的纪年。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如在阅读原始史料和二手读物时,他们仍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这些史料和读物仍是传统纪年。

毫无疑问,这种袭用传统纪年的情况必然会在心理上妨碍中国史同世界史的融合。

公元前两千年末以前,中国尚无文字史料,但却有大量传说,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把中国的王朝推到公元前三千年代。武汉大学的安长春、周友光、吴友法撰写的世界史就是如此地利用了传说。这是为撰写整体世界史作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编者均是吴于廑的学生和合作者,他们在著作中显然对横向联系的思想作了试验性的运用。

1988年12月访问武汉期间,我同安长春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们可能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但是我们却都同意:该书对于打破中国世界史的框架是一个好的尝试,这一尝试应该继续下去,国外学者的一些建议对此是有帮助的。

安长春、周友光、吴友法编著的世界史清楚地表明,把中国纳入世界史过程中在历史编纂学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已在该书阐述早期文明的第二章中看到了这些问题。该章分节依次论述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西亚地区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字史料写成的政治事件史,而且将其描绘成一个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与平民斗争的阶级社会。但是,在早期中国史部分,却介绍了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比较有肯定价值的是关于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观念。中国基本上是个农耕社会,她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史是能够同其它农耕社会相结合的。不过,该书也表明,把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概念当作一种总的模式应用于欧亚大陆史之前,尚须作更多的研究。

对于中国历史还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从世界史学的背景下看是说得通的,即分与合的观点。公元220年汉王朝崩溃后,就是各国林立的局面,以后则是西晋的大一统,公元313年西晋灭亡。“自西晋灭亡以后,国家分裂,战乱不止,人民渴望实现全国统一,各民族的大融合,江南的新开发,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实现全国统一的条件。”

显然,中国史的这一传统看法,是符合把近代国家看成是世界一个单位的概念的。正如上面已指出的,该书含有打破国界的意图,一些章节的标题就说明了这点。但该书给人的总印象是,它要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那种教条主义的世界史模式,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只有对近代历史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才能用统一的史学取代1949年前后的中国传统史学。

在中国的世界史中也有一些论述其它大陆和次大陆的通史性著作出版。一部有关拉丁美洲史的著作试图把综述和分国专述结合在一起。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拉丁美洲的总体发展,第二部分则按族别撰写(李春辉:1983年)。地区史在将来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注意,因为现在已有不少地区研究中心,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里面工作。此外,研究世界各个地区的全国性学会就有16个。不过,要写一部整体性的地区史,还得一些时间,因为它们首先需要撰写和重写有关该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中东地区就是这种情况(1988年11月25日与彭树智的谈话)。据说,东南亚史正在编写之中(1988年11月21日与周南京的谈话)。这些地区在过去的中国世界史领域里却是不大为人重视的。对各地区在整个世界史的地位的真正体验,只有在东亚史和欧洲史的著作出版以后才有可能。东亚地区史必须包括中国,可是把中国融于其中所遇到的问题比把它融于世界通史中遇到的麻烦还要大。直到现在,在中国的世界通史中,欧洲仍占大约一半的篇幅,它使读者感到这不过是一部加了一些其它地区作为陪衬的欧洲史,而且这种欧洲史也仅仅包括一些国家和根据五种生产方式教条挑选出来的一些事件,谈不上是整个欧洲的历史。一部真正的欧洲史,必须把欧洲作为一个历史实体,并把它作为一个有机部分融入整个模式之中,以帮助人们既了解欧洲内部的发展过程,又了解它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

五、结 束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编写一部包括所有国家并说明人类从原始时期到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其方法是使历史事实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中国史完全是中国史专家研究,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史部分。但是在探索世界历史模式中,中国史无疑又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史在中国的史学中又占有一席之地。1978年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家可能不完全同意这种发展,而且对于如何重新解释世界史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摆脱1978年以前僵化的迹象则是明显的。

同样重要的可能还有下面一些情况,许多老一代和年轻学者已对一些敏感的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并且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总之,世界历史经线的走向和转折将更加复杂化、多样化,而纬线则变得更加明显。两者相加将形成一张网,这张网更像丝织而不像麻织的。它已为织成一幅新的刺绣品作好了准备。

(李荣建译 李世洞校)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